

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跨世紀課題

— 近期大陸關於高等教育大眾化討論綜述

劉小流

廣州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在現代社會，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社會文明進步程度和國力強弱的一個主要標誌。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大眾化、普及化（註一）就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發達國家早在 60-70 年代就進入大眾化階段，現在已經進入或正在進入普及化階段。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已進入大眾化階段。隨著近年大陸社會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科教興國”政策的提出，在知識經濟曙光初照的今天，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大陸「教育部」頒訂的《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大陸「教育部」，1999a）和第三次大陸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公布的《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大陸「教育部」，1999b）都重新修訂高等教育發展的指標，目標十分明確和清晰地發起向大眾高等教育階段的衝刺，預定 2010 年使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 15%，也就是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因而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 90 年代，特別是近兩年來人們關注的焦點。

概觀大陸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之討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90 年代初（註二）至 98 年左右，主要討論高等教育要不要大力發展、要不要大眾化，涉及包括大眾化的含義、大眾化與質量、社會不平等和教育過度等問題？第二階段為 98 年至今，主要討論大眾化的策略問題，包括大眾化的“途徑”、“模式”和“速度”等。

一、大眾化的高等教育標準是否僅指入學率？

如果按照高等教育大眾化入學率的標準，則大陸的高等教育達到大眾化階段的最低限度還有相當的距離（如 1997 年大陸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為 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也僅為 9.1%）（潘懋元，1999）。

然而有學者認為不能祇用適齡人口入學率作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標準，而應根據大陸人口狀況、經濟發展特點和人才培養特色，得出大陸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標準。因此，大陸有人認為應從高等教育機構“學生的階層分布，教學內容和培養出人才的服務面”作為標準的新思路（劉堯，1998）；也有人認為大眾化不僅指量（入

學率)的增長,還包括質的變化,即包括教育觀念的改變、教育功能的擴大、培養目標和教育模式的多樣化,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與方式、入學條件、管理方式及高等教育與社會的關係等一系列變化(潘懋元,2000)。還有人認為大眾化高等教育還應包括大大提高現有和未來就業人員中(包括農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以及使用相當多的高等學校建成普及應用和市場主導型的學校(劉勤勇,1999)。據此大眾化高等教育不僅包括“量”的增長,還包括“質”的變化。這裡所講“質”的變化指高等教育體制、內容、教學形式等方面向社會開放,包括將大部分高等教育機構推向市場,增辦社區學校,面向大眾改造高等教育內容,以適應市場需求。

二、高等教育大眾化會不會帶來教育質量的下降？

反對者從四方面論述高等教育發展快了,質量會必然受到影響,其理由為:1.從教育經費的再分配來看,教育經費總額有限,高等教育成本相對偏高,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必然占用中等教育經費,導致中等教育質量下降(劉少雪,1998)2.在投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高等教育機構可挖掘潛力有限,盲目擴大招生規模,將導致高等教育質量下降(劉勤勇,1999)3.私立高等教育的收費偏高,質量無法保證,並不能擔負起大眾化的重任(龐守興,1998)4.面對迎接新世紀的挑戰與機遇,大陸高等教育在發展數量與質量問題上,更應重視質量的提高(龐守興,1998)。贊成者認為質量是一個相對概念,是分多層次的,大陸高等教育機構層次不同,質量也應分層多樣化;而且質量的比較應是在等質情況下進行,質量的提高是一個積累漸進的過程,應允許新誕生,新組建,新提級的學校一定時間去探索試驗,從而達到預定的標準(王一兵,1998;潘懋元,2000)。有人認為質是和一定的量相聯系的,有了數量的增長湧現出高質量的人才總會比控制發展時期的多,即使是新增加的大學生質量較低,但受過高等教育總比未受過高等教育要好(何祚麻、蘭士斌,1998)。也有人提出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可通過變“嚴進寬出”為“寬進嚴出”來保證,使高等教育發揮培養和篩選的雙重功能(何祚麻、蘭士斌,1998)。也有學者從精英和大眾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培養規格和社會適應面指出兩者的不同質量觀,在即將進入大眾化階段,必須改變傳統的精英教育質量觀為大眾教育質量觀,培養在人才市場上適銷對路的專門人才(潘懋元,2000)。在我們看來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和大眾化的生命線;大眾化與高質量雖然難以兩全齊美,但是適當擴大規模與質量降低並不具有明顯連帶關係;無論精英高等教育和大眾高等教育都應有其相對的教育質量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受市場競爭影響也會注意其質量的提升;我們贊成這種觀點即“無論在原則上或實踐中,我們不能同意讓一個目標屈從於另一個目標”,沒有質量的大眾化無異於資源的浪費。

三、高等教育大眾化是否會加劇社會不平等？

反對者認為當前現實條件下,尚無力全面普及義務教育,為照顧部分方面擴大規模,必將加劇社會不平等(劉少雪,1998);伴隨高等教育機構收費制的迅速全面推進,也會造成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平等(張人杰,2000;吳福光,2000a;劉少雪,1998)。贊成者認為大陸近年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為高等教育大眾化提供了基本條件,大部分居民對高水平、高質量教育的強烈需求和投資欲望為大眾化提

供了泉源保障和一定的經費支持（何祚麻、蘭士斌，1998；葉欣茹，1998）；而且完全用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高等教育大眾化，並不能獲得令人滿意的回答，因為有些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國家同樣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鄔大光，1999）；大陸將長期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經濟發展水平，制定有彈性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才是明智之舉（鄔大光，1999）。我們認為：應聯繫社會發展，客觀辯證地看待社會平等問題；大陸高等教育機構入學率高低要受人們的教育理想與高等教育機構限制的雙重制約，高等教育機構錄取分數線並非接受高等教育的智力線，而是由於資源的缺乏和發展的要求選擇那種有點嚴格限制的選拔方式，換言之，這裡涉及對人的尊重和社會的需要兩者協調的問題；絕對的公平本來就不存在，抑制發達地區的高等教育需求本身就並不體現教育公平；區域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探索和實踐可為大陸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逐步展開和推行提供思路和經驗。

四、大眾化是否會造成“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

反對者認為：社會分工的存在對人們知識技能的要求並不是統一的，現階段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人才，效益主要表現為“以最少的代價滿足發展的急需”，大學規模過大，投入過多反而會造成效益的下降，在經濟水平不高的情況下，片面追求升學率是一種捨本逐末的做法（劉勤勇，1998；劉少雪，1998）；從經濟形態看，大陸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增加熟練的勞動力和技術人員仍是重點；從就業者現狀來看，具有初中和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員仍占大多數，因而教育發展仍是低重心，大眾化屬於一種超前行為（劉少雪，1998）；現在高等教育機構畢業生供過於求，再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必將出現“過度教育”，出現高等教育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惡性循環，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甚至帶來社會不穩定（夏再興，1998；曲恒昌，1998；文冬毛 1998）。贊成者認為大陸高等教育無論從“存量”（25歲以上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者比例）還是“增量”（當前大學入學率）都遠遠落後於經濟和社會發展步伐，我們的大學生不是足夠，而是需要更多，高層次專門人才從總體上看是相當匱乏（何祚麻、蘭士斌，1998；李崑，1998）；中國面臨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國民經濟工業化和信息化並重帶來的嚴峻挑戰對普遍提高人們受教育程度的迫切要求，為高等教育大眾化提供了發展契機（王一兵，1998；何祚麻、蘭士斌，1998）；21世紀將進入知識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大多數青年必須作好充分的知識準備，接受高等教育將是青年們迎接挑戰的重要前提；擴大招生規模可從一定程度上紓解升學就業壓力，滿足居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挖掘高等教育機構潛力；“發展教育不會產生人才過剩的問題，因為人已經在那裡了，你不讓他受教育，受更高層次的教育，他也還是過剩，而且是低素質的過剩，對社會更不利”（北京晚報，1999）；高等教育大眾化將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將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有利於“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發展）”，對經濟良性循環和知識產業的增長作用不可低估；目前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是因大學專業機構設置不合理、人們的就業觀念及大陸的就業制度沒有改變（何祚麻、蘭士斌，1998；林雪，1999）。我們的觀點是：發展教育不能僅僅看到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應考慮教育自身的規律性；教育並不只是適應經濟的發展，而且高等教育發展規律本身就要適度超前經濟發展，這裡涉及如何確定“速度”，現在和五年、十年後的“速度”

是否會有所變動。

通過第一階段的爭論，大眾化應是大陸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必然趨勢成為多數人的共識，爭論的焦點逐漸從“要不要”轉到大眾化的“途徑”、“模式”和“速度”上。

五、大陸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前提條件是什麼？

如何推進大陸的高等教育大眾化，人們普遍認識到其中的困難主要是觀念和體制上的問題，並不存在基礎上的不可跨越的障礙，因而人們現存的“觀念”轉變和“體制”弊端的改革成了能否加快大陸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前提條件和必經途徑。

首先應轉變觀念，包括：1.轉變教育單純為事業的觀念，教育具有產業的屬性，高等教育尤其要引進產業經營的觀念，把高等教育當作產業來辦，一改過去由政府包辦為“勞動者的投資行為”；2.高等教育的產品—人才不僅是“準公共產品”，還具有“商品性”；3.人們的畢業就業觀念要改變；4.社會需求是多方面的，教育和人才的質量也應是多層次的。

其次應改革大學的辦學體制和其它相關體制。辦學體制的改革包括管理體制的改革，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允許高等教育結構及專業設置多樣化，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單一性培養模式，允許多種力量辦學，推進大陸高等教育產業之路。改革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的勞動、人事和分配制度，廣泛實行公開招聘的方式，以利於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六、高等教育模式和速度是怎樣？

有人認為目前大陸高等教育機構規模的逐年擴大，但是布點多規模小運轉效率低，在考慮到大陸未來高等總體規模的擴大應採取內涵式為主導的發展策略，通過調整高等教育內部結構與整體發展的關係來提高高等教育機構的運轉效率（魯媛風、楊國鋒，1998）。也有人提出大陸高等教育不僅應從挖掘內部潛力角度，擴大高等教育機構規模，還提出在外延上應大量開辦短期大學、民辦私立高等教育、開放式和網路化的遠距離高等教育等形式多樣的高等教育，使它們成為大陸高等教育大眾化起飛的另一翼（萬秀蘭，1998；正一兵，1998）。有學者基於大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指出可走由“城市——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農村”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道路（葉欣茹，1998）。另有學者著重從生態學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的規模與速度，認為應遵循教育自身的規律，使高等教育的發展符合大陸社會發展的需要（教育文摘周報，1999；吳福光，2000b）。我們贊成：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數量的擴展來滿足居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應注意高等教育內部運轉效率的提高；不能盲目追求速度，而應在大眾化的發展中力求穩定，積極穩妥地推進大陸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

註釋：

註一：關於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說，世界公認以美國高等教育史學家馬丁·特羅（Martin Trow）1973年提出的對高等教育發展三階段說為標準，即一國的高等教育能容納的適齡人口（18-21歲）在15%以內為英才高等教育階段，

能容納適齡人口 15-50%的為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能容納適齡人口 50%以上為普及化高等教育階段。

註二：1990 年胡鞍鋼首先在其《中國：走向 21 世紀》（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91 年版）提出高等教育適度發展論引發了大陸高等教育是否要大力發展，是否要大眾化討論的開始。

註三：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簡而言之指通過教育獨得的知識技能高出工作崗位對知識和技能的要求或超過社會的吸納能力而出現知識失業的現象，也即教育供給大於需求的現象。

參考文獻

- 大陸「教育部」(1999a)。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光明日報，1999,02,2
- 教育部 (199b)。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國教育報，1999,06,17
- 潘懋元 (1999)。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之路，新華文摘，第 5 期。
- 潘懋元 (2000)。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教育質量觀，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第 1 期。
- 劉堯 (1998)。高等教育大眾化新論，嘉應教育學院學報（綜合版），第 1 期。
- 劉勤勇 (1999)。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綜述，上海教育科研，第 4 期。
- 劉少雪 (1998)。不宜盲目擴大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規模，高等教育研究（武漢），第 1 期。
- 龐守興 (1998)。高等教育大眾化：一種理論誤導，高等教育研究（武漢），第 5 期。
- 王一兵 (1998)。知識經濟、信息社會與高等教育大眾化，上海高教研究，第 6 期。
- 何祚麻、蘭士斌 (1998)。高等教育是適度發展還是大力發展，上海高教研究，第 7 期。
- 張人杰 (2000)。“教育產業化”命題能成立嗎，教育評論，第 1 期。
- 鄒大光 (1999)。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新華文摘，第 5 期。
- 夏再興 (1998)。論中國的教育過度，教育科學，第 2 期。
- 曲恒昌 (1998)。若幹國家過量教育的持久化及其對我們的啓示，比較教育研究，第 4 期。
- 文冬毛 (1998)。過度教育研究的方法、結論及啓示，1998 年高等教育年會論文（未發表）。
- 李崴 (1998)。大陸大學生多了嗎，團結報，1998,04,11 北京晚報，1999,07,08 教育文摘周報，1999,04,28
- 魯媛風、楊國鋒 (1998)。中國高等教育應該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山東師大學報（哲社版），第 3 期。
- 萬秀蘭 (1998)。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趨勢與短期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中國大復印資料），第 8 期。
- 葉欣如 (1998)。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前景展望，高等教育研究（武漢），第 1 期。
- 林雪 (1999)。教育：包袱能不能變成錢袋，新華文摘，第 9 期。
- 吳福光 (2000a)。市場機制下教育的產業性與教育機會均等，教育導刊，第 4 期。
- 吳福光 (2000b)。如何面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羊城晚報，2000,04,29

許地球一個未來 給台灣一塊樂土

楊永慶

科學家發現養雞場的雞隻，主人愛護他們，經常放音樂，生的雞蛋多，品質又好。同樣的，科學家也發現，養的盆景，主人愛護它們，除了澆水之外，經常撫摸它們，對著它們說說話，花草樹木都會長得特別漂亮。可見，不只人需要愛，動物、植物都需要愛。其實，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也將終老於斯的地球，更是需要我們的『愛』。但是，我們除了「有土斯有財」，千方百計去「佔有」它之外，從來沒有想過好好去疼過地球、愛過地球。怪不得當年的關賊張獻中，有這樣的感嘆：「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

大地，如同您我，是個有機的生命體，它無私的承載我們，養育我們，愛護我們，是我們的父母。儘管我們為了自己的私利，排放黑煙，污染空氣；製造空調，把臭氧層「穿洞」；還肆無忌憚的濫墾濫採，把地球搞成千瘡百孔，但它仍然默默的自我承擔，自我調整，對我們人類從來沒有反撲之心。而這個有機體，在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形成很多科學家無法解釋的「引力」，使大地變色，讓蒼生「苦厄」。例如，九二一大地震，讓我們好多的同胞為我們而受難；這次小小的輕度颱風——桃芝，又是好多的家庭破碎。地球從沒反撲之心，只是，我們這群教育工作者，從來沒有教導我們的民眾，愛護這個地球，任令他們破壞地球。

台灣，是個美麗之島。

主宰人類的行為，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而是教育。十八世紀以後，我們毫無疑問的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人類既然是動物演進而來，猿猴是人類的祖先，所以我們的教育，要把生存競爭所需要的知識，有系統的組織，有效率的「灌輸」在我們的學生身上，千萬不能讓我們的學生輸在「起跑點」上。不只要贏別人，也要人定勝天。

前半個世紀，台灣的教育，讓台灣的經濟，出人頭地，出現了台灣奇蹟，原因無他，我們競爭的教育，展現了傲人的教育成果。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把這套「競爭的教育」，用來建構我們的政治，期望為台灣創造第二個奇蹟。其結果，誰也不服誰。於是大家在意的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因此，政治人物不講究倫理，政黨也豪無緣由的惡鬥，逐至政府的機器空轉。要生存的，必須破壞大自然；要成功的，必須犧牲別人。十幾年來，人人您爭我奪，殺人放火，無日無之。以致於治安敗壞，經濟逐漸蕭條，台灣眼前已經不再是個美麗之島。

教育，是人類的希望。競爭，絕對不是生命的「本質」。未來，我們的教育應該從人與人爭、人與大自然爭，轉個方向，自我挑戰，也就是說今天的自我與昨日的自我「競爭」。處處與別人比較、計較，那生活多沒意義，也不自在。

我們每個人都有無盡的愛，愛自己、愛家人，進而愛這個社會、愛這個地球，如此的挑戰自己，心中的愛，今天我的愛，有沒有比昨日的我，愛得更多，愛得更廣？願我們這群教師，重新對生命『聚焦』，提倡尊重與愛，責任與義務。好好的愛我們的地球，『許』地球一個未來；多尊重別人，給台灣一塊樂土。